

聽君一席話 心潮逐浪高

章剛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出席香港大學百年大慶的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顯示出我們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對知識和人才的要求和對科學技術的重視，也反映出我們民族已走向開明和開放；陽光普照、正氣恢宏、國運昌隆、繁榮安定；在此也祝願香港大學和全港專上院校不斷培育人才，為祖國的復興大業貢獻新力量。

自留地

李克強副總理百忙中安排時間到香港出席《十二五規劃論壇》和政府新廈開幕及香港大學百年校慶等重要活動，李副總理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於香港乎？果然，不負眾望，他又給香港人帶來了多方福祉，幾十項具體內容自有高人分析論及。我作為一介耕夫稍沾一些科學技術，而且與香港大學也有一些淵源，所以特別對8月18日上午港大百年校慶一幕感到興趣。坐在電視機前一邊看着直播一邊浮想聯翩。

港大陸佑堂裡那莊嚴的典禮我曾參加過幾次，所以儀式過程並不陌生，只是今次的發言很有啟發，引人深思。首先是徐立之校長，他闡述了校史和大學的任務，其中特別強調了和祖國的關係；他是留美的，可是說的不是「牛仔英語」，比奧巴馬的好聽多了；中段他改用普通話解釋了校訓「明德格物」，指出大學就是要以此為訓培育人才。今天，我覺得社會上也需要強調「明德格物」。「明德」是要明白真理，彰顯美德善良人格，提高個人修養止於至善。「格物」是懂得研究分析事物，是修身齊家治國的基本方法。

第二位發言的是白髮蒼蒼的前港督衛奕信，他以英國阿巴丁大學校監的身份作為嘉賓，同時也是港大校友，1960年在這學過中文。開口便是流利的京片子，博得一輪掌聲，他舉了幾個阿巴丁大學師生和中國的關係和作過的貢獻，悅耳的英語和輕鬆可親的講話令我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香港大學百年校慶典禮並發表講話。

感到舒暢。正如他說，大堂內的氣氛和室外的陽光同樣璀璨和煦。

李克強親民愛民好學不倦

然後重點發言的是主禮嘉賓李克強副總理。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說話很有感染力。溫家寶總理給大眾的是文質彬彬、憂國憂民的長者風貌，來到群眾中表現愛民如子的血肉親情。李副總理的談話以及幾天來親訪民居、細詢民生、體察民情的決大度和平易風度就顯示出他那親民如友、愛民如己的豪爽樸實作風。他讚揚港大師生的成績和貢獻，鼓勵師生們和校友們要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出智慧和能量；他強調港大要立足香港面向祖國放眼世界。為了使港大師生更好更更全面更深入地認識祖國，他公布了一項振奮人心的喜訊：祖國會成立一個專項基金，每年選送一千名港大學生到內地學習、考察和開展科研活動，這一消息立刻贏得全場熱烈掌聲。末段，李副總理用英語回應徐立之校長的講話，祝願港大發揚光大不斷取得成績，不以現在已高踞亞洲大學排名榜首為滿足，更要向成為世界知名的大學繼續邁進。李副總理有博士學歷當然有一定的外語功底，在日理萬機的緊張工作中能抽時間保持外語水平，足以說明他的好學不倦兼顧多方的精神和魄力。

三位的發言無獨有偶都是兩文雙語，我覺得這並不是花巧更不是賣弄，和香港人有時不必要也在說話中加幾句「洋涇浜」大有不同。這三位世界級的政治、學術界人物，用雙語發言，一來是表示對不同國籍的來賓的尊重，二來也是表示對語言的尊重。例如，徐校長用中文解釋港大校訓，將「明德格物」的真義解釋得透徹精深，並且認為英譯和拉丁譯文都未盡其義。當然，有道是翻譯應循信、達、雅，白話文已經難盡顯真貌，古漢語則更有難度。朱生豪出入莎翁著作，翻譯了他的全集，不可謂不懂莎翁精粹，但是讀起《哈姆雷特》或者其十四行商韻體，還是以原文最具神采和韻律。

重視科技人才民族復興有望

最突出的是三位發言者都很強調科技和人才的重要，可以體會到現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任的確有賴知識分子特別是年青的知識分子的參與，和具有真材實學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投身到這有著劃時代意義的運動中去。在年青人面前展開的這片廣袤的天地可以讓你們馳騁飛揚大演身手。三位盛典上的發言都指出了港大和祖國的關係，她不僅是港人的驕傲而且也是在祖國有一定地位的學府、是祖國人民關注的大學。無論在國內或者國際上，凡是國家所重視和培植的大學都特別享有盛名，廣州的中山大學，至今還珍重地保留著「國立中山大學」的石牌樓，予人以崇高的形象和地位。國家副總理蒞臨港大慶典正表示了國家對港大的關愛和重視，作為港大師生和香港市民都會覺得是榮譽和鞭策。

國際經濟局勢變化很大，不易預測。因此，政府施政也必須保持一定的靈活性，特別是房地產政策。本屆政府最後一年的任務是盡力、盡快尋找土地，重新規劃各類土地的應用，成為特區政府的土地儲備，特區政府可因應樓價的變化、市民的需求、國際經濟狀態來靈活地供應到市場。

近來，立法會議員要求興建居屋的聲音沉靜了。為什麼？因為樓價下跌了，最新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已經創兩個月的低位，下跌5%。近一陣子，沙田九肚山土地拍賣，僅一口價就成交，創出土地拍賣會最快成交的紀錄。地產商也開始謹慎買地了。與此同時，全球股市急跌，恒生指數創兩年低點，歐洲債務危機揮之不去，歐洲諸國的銀行都面對巨大的危機。而美國更糟糕，遭評級機構降級，失去AAA的最高國家主權評級。美國的種種經濟數據都很差，看來發生「雙底衰退」的機會確很大。

外圍經濟轉差風險高

去年年中，美國也曾經出現過「雙底衰退」的危機。後來，美國聯儲局推出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簡稱QE2），「雙底衰退」才沒出現。現在QE2結束了，QE3仍推出無期。QE3之所以推出無期，是因為聯儲局印鈔票的行為在美國引起激烈的爭論，不少人反對。想競選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一的德州州長佩里（Perry），近日更以「叛國」來形容負責QE2的聯儲局主席伯南克，他認為聯儲局印鈔票的行為形同「叛國」，導致美元貶值……

歐美步入「雙底衰退」，內地則面對居高不下的通脹。為了打壓通脹，中央政府緊縮銀根的政策已持續大半年，上海、深圳股市已經反覆下跌一年多。內地銀根緊縮，肯定也影響了香港。很明顯地，內地富豪不見港炒樓的新聞少見了，如果有一天，廣東道排隊買名牌的人潮不來了，那麼，問題就更大了。

房地產政策應隨經濟形勢而變

雖然香港失業率依然很低，但是不少經濟學家都認為這可能是最低點了，失業率很快就會回升。歐美經濟一旦衰退，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目前，特首曾蔭權正在到處聆聽各界人士的意見，為撰寫施政報告作準備，我希望他能留意到目前國際經濟的嚴峻形勢，千萬不要重犯1997年特區政府犯的錯誤。當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但是，特區政府仍然感覺不到危機，依然按計劃推出「八萬五」，成了之後房價大跌的受害者。

國際經濟局勢變化很大，不易預測。因此，政府施政也必須保持一定的靈活性，特別是房地產政策，香港可供發展建屋的土地不夠是事實。因此，本屆政府最後一年的任務應該是盡力、盡快地尋找土地，重新規劃各類土地的應用。經過規劃之後的土地，就成為特區政府的土地儲備，香港各地產商在其常年報告中都會詳列出他們的土地儲備，我認為特區政府也應該這麼做。有了土地儲備，再因應樓價的變化、市民的需求、國際經濟狀態來靈活地供應土地到市場。

因時制宜調整土地政策

曾淵滄 博士

借鏡中國經驗 共創雙贏時代

單志明 浙江省政協委員

美國首次失去國債主權評級AAA地位，引起舉世震動，全球股票大幅下跌，金融危機迫在眉睫，怎麼辦？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也紛紛出現經濟危機，而英國倫敦托特納姆區的騷亂，則蔓延其他城市，連同早前的以色列騷動、挪威連環襲擊，西方似乎正步入後金嘯海嘯所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困局。

與西方的動盪相比，中國的發展保持平穩快速增長。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及2010年英國首相卡梅倫訪華時，都承認中國的制度獨特、成功，這些西方的政治領袖已經認識到西方資本制度的明顯不足，阻礙了經濟的發展，需要借鏡中國以及東方的經驗與智慧來獲得啟示，彌補西方制度的缺陷。

儘管中國的發展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包括過分注意發展的速度而忽略了發展的質量，過分強調硬件的建設而忽視了軟件的建設，導致發生令人遺憾的不幸，但是，瑕不掩瑜，這些過失絕不會令中國發展的成就失色，也絕不應因此全盤否定中國發展的成就，中國勇於面對自身發展的不足，並已努力改善。別有用心的人欲誇大中國發展的失誤、拚命唱衰中國，最終枉費心機。今天國家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中國政府和人民信心十足地面對挑戰，克服困難，正穩步走上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

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成功探索出一套適合自己發展的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與肯定。中國的發展模式對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正是因為中國積極學習國外的先進文化、技術和管理方法，不斷改善自己，取得進步。這種中西智慧結合、取長補短的發展模式，可以推動人類共同進步，值得今天的西方國家參考，為解決目前的困境找到出路。

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無限的機會，希望西方社會面對現實，放下有色眼鏡，虛心地向中國學習，重振經濟，與中國攜手構建更美好的世界。

靠美元橫行世界將成過去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許多人認為，美國近百年的強大是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但從國會山近期有關債務上限問題的爭論可以看到，正是共和、民主兩黨充分利用「美式民主」的缺陷，屢屢出現如此「高耗能」的折騰。從這個角度講，「美式民主」根本沒有什麼優勢。美國強大的原因是二戰後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因為這個會議確認為美元為世界貿易結算貨幣；由此美國可以利用美元這棵「搖錢樹」，「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維持聯邦政府運作、支付龐大軍費、支持世界各國的反政府武裝、並度過由「美式民主」釀發的經濟災難。由於華盛頓不講信譽，靠美元再橫行世界的時代即將成為過去。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美國人長期在「美元」這棵大樹下乘涼，已經「身在福中不知福」。因為有美元這個後盾，美國政府習慣了「對世界指手劃腳、隨意對他國動武、唯恐天下不亂」的思維；民眾也養成了「拒絕儲蓄、今日用明日錢」的惡習。政府的行動和民眾的習慣最終破壞了讓他們賴以生存的美元價值和信譽，橫蠻廢除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的保證，瘋狂地向世界各國借債。「用新債還舊債」辦法來處理財政，當債務達到無法償還的境界後，竟然希望通過「違約」來一筆勾銷。如今相信華盛頓的國家屈指可數，美國將不得不食其果。

科技等投入造就超級大國

上世紀中葉，美國信守「布雷頓森林會議」每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承諾，使美元的使用價值等同黃金，所以美元又被讚稱為「美金」。隨着世界貿易額迅速增多，相關人員的國際往來也大幅增加，在銀行科技尚不如今天發達的當時，人們感到出入攜帶美元更為方便，美元也就成為家喻戶曉的頭等通行貨幣。因為美國可以隨意印製和發行美元，使美國發展有了充足的資金，加上美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美國的發展很快進入二戰後的「快車道」。華盛頓於是大舉擴大大對科技、教育、軍事、基礎的投入，使之迅速成為世界超級大國。

充足資金投入，使美國發展快速，特別是對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吸引了大批來自全球的一流人才，而人才的匯聚，為美國的科技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科技成果的增多更加為美國企業的騰飛提供了翅膀，使美國形成極佳的良性循環。發動越南戰爭後，五角大樓需要大量資金，白宮於是放棄「美元保兌黃金」的承諾，大量印發美鈔，人為地讓美元



美國利用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對世界指手劃腳的日子很快成為過去。

貶值。美元貶值使美國輕而易舉地獲取了巨額不義之財，讓儲蓄美元的國家和民眾遭受了巨大損失。上世紀80年代，美國出現經濟危機，美國再次利用大量發鈔度過難關。

「美式民主」將美國推向深淵

布什當選總統的2000年，美國的債務僅為5.7萬億美元，國際市場的黃金價格為280美元兌1盎司。9·11事件後，時任總統布什決定進攻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中情局立即緊密配合，以「拉登的基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為白宮提供了莫須有的「戰爭依據」。好戰的五角大樓也不示弱，在美國國會以「解決阿富汗和伊拉克」需要的資金不超過1000億美元，所花的時間不用6個月」的懸壺戰爭預算，讓美國議員投票同意發動兩場至今仍然無法自拔的戰爭，讓美利堅陷入前所未有的債務危機。

布什2008年下台時，美國的債務已增加到11.5萬億美元，八年執政，美國國債增加了5.8萬億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000億美元，是美國有史以來債務增長最快期。奧巴馬上台後，迅速從阿富汗、伊拉克撤軍的承諾無法實現，又帶領北約開拓了利比亞戰場，迫使美國繼續大舉借債，到債務超過14.2萬億美元的上限時，才手忙腳亂尋求解決之道，從而發動了國會山上的口水戰。從上世紀美國快速發展可以看到，是美元支撐了強勢。從中情局、五角大樓提供給國會的阿、伊兩戰理據也可以看到，是美式民主將美國推向深淵。

現階段中國改革需要重視的幾個問題

邱震海 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世紀風雲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從高層到媒體都對「消極腐敗」現象保持高度警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日前發表評論稱，「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期，急需給權力套上制約的籠頭；行政管理與市場經濟的磨合調試，潛伏著尋租的隱患。……腐敗文化存在，必定驅使「能力」走向歧途，讓「精英輩出」、「能力非凡」在錯誤軌道上產生更大危害。」

就腐敗的根本原因而言，筆者則傾向於將今天中國的情況，歸結為「非典型市場經濟」體制。用這一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問題，將有助於人們擺脫情緒和政治立場的紛擾，沉下心來直面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層邏輯。

轉型期中國：不同於西方的政府干預功能

所謂「非典型市場經濟」，正如筆者在之前的評論中所指出，其關鍵在於無法完成政府和市場的分離，同時無法建立獨立的法治。市場經濟不僅僅是市場，也不僅僅是經濟，而是需要一套「市場、政府和法治」三位一體而又互相分離的關係。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將近二十年後的今天，當中國已經遇到一系列瓶頸之後，恐怕是到了人們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這一點的時候了。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也必然帶來另一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三位一體的關係的深刻變化。這在中國工業、經濟和社會形態轉型（亦即筆者歸納的中國三大轉型）中，尤其是在社會形態的轉型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

問題是：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之間究竟應該呈現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問題不但困擾今天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而且也是西方經濟和政治學人經常討論的問題；只不過，今天的中國由於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人們的認識顯得尤其混亂而已。

幾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當美國等自由經濟國家強調政府干預的時候，不但中國媒體歡呼「中國經濟和政治模式行之有效」，而且就連美國媒體自己也感歎「美國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在西方國家，從亞當·斯密斯強調自由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以及政府作為「守夜人」的無為而治的角色之後，政府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就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上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危機之後，美國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的干預功能，給羅斯福新政以極大的理論支持。二戰後，德國實施社會市場經濟，強調政府「可能時盡量少干預，必要時盡量多干預」（So wenig Staat wie moeglich, so viel Staat wie noetig）。兩者本質上都是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干預功能，但還是有些許差別：凱恩斯主義從個體經濟活動的非理性和「動物精神」出發，強調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支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這樣即便不能避免衰退，也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社會市場經濟則強調政府的監管功能，但卻要求政府尊重市場的主體行為。

然而，今天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脫胎於計劃經濟，而又尚未完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所謂尚未進入市場經濟，是指中國在政府職能上，始終未能完成向服務型小政府的轉型。今天的中國，雖然企業和市場的運作已完全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桎梏，甚至政府也已不再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但在行政體制形態方面，中國則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政府主導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主義或社會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干預功能，與今天中國的政府干預，不是在相同定義域裡可以討論的問題；前者是成熟市場經濟下的政府角色（雖然是有爭議的政府角色），後者則是脫胎於舊體制、亟待改革但卻又時刻受到舊體制思維牽制的政府角色。將兩者混為一談，很可能由此而模糊了中國現階段矛盾的真正焦點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現階段中國的最大問題，依然是政府職能轉型的徹底。正是這一問題，導致了中國的「非典型市場經濟」狀況，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矛盾和衝突。